

请战书上的8枚红手印

■杨港科 马忠达



主要火力枢纽，架设数十挺轻重机枪构筑起密集交叉火力网，完全封锁了我军的进攻通路。

第13纵队将主攻任务交由第37师111团1营3连执行，3连在枪林弹雨中多次发起冲锋，官兵持续出现伤亡，攻行动陷入僵局。作为第二梯队待命的1连官兵看在眼里、急在心头，全连官兵纷纷向营部递交请战申请，主动请缨接替3连攻坚。

时任1连副连长林玉亭亲笔拟就简短请战誓词：“为战友报仇，誓死夺占小宋庄。”其余7名党员作战骨干得知消息后，迅速聚拢在煤油灯一侧，依次在请战书上签署姓名，郑重按下指尖血印。至此，一支全员为共产党员的攻坚突击队正式成立。突击队的请战请求最终获得批准，队员们提前做好个人物品，托付给后方留守战友，人人写下简短家书。他们深知此次突击任务九死一生，却无一人显露丝毫退缩，全体一致立下“党员先上、有险我扛”的生死誓言。

夜色笼罩战场，8名突击队员分成两组交替掩护，轻装携带炸药、手榴弹、刺刀，向敌军火力最集中的独立房隐蔽穿插。通往据点的开阔麦田毫无遮蔽，敌军探照灯来回照射，机枪子弹不断横

扫地面，泥土在火光中不断飞溅。队员们压低身子匍匐前进，全程依靠手势沟通，不发出一点声响，灵活躲避炮火与流弹，一寸寸向独立房逼近。

战场凶险接踵而至，行进途中一枚敌军手榴弹突然在突击队员旁爆炸，队员张同生当场被炸翻在地，数枚弹片深深嵌入身体。剧痛席卷全身，他没有呼喊求援，就地强忍钻心疼痛，徒手抠出体内两枚弹片，简单包扎伤口后立刻起身，跟上队伍继续向前冲锋，全程坚守突击一线。

战斗进入白热化，敌军察觉侧翼威胁，调集全部火力对准突击队疯狂扫射。队员杨洪刚始终冲在队伍最前方，直面敌军正面火力阻击。整场战斗他先后4次负伤，最后一轮突进时，炮弹碎片直接炸断他的右手。即便身负重伤，他依旧没有停下冲锋脚步，强忍剧痛用左手托起步枪，持续向敌阵地射击，直至生命最后一刻，身体仍保持向前冲锋的姿态。

其余队员依托炸塌的鹿砦、断墙与敌军展开殊死肉搏；步枪子弹打光，就捡拾敌军遗弃枪械再战；手榴弹耗尽，就抽出刺刀贴身拼杀。队员们相互掩护、彼此支援，凭借钢铁般的战斗意志，逐层摧

毁敌军外围明暗地堡，最终逼近扼守整条进攻路线的独立房。

经过整夜惨烈厮杀，突击队成功端掉这座敌军最重要的火力枢纽，全歼独立房内70余名守敌。此战，这支由8名党员组成的突击队，3人壮烈牺牲，5人身负重伤。党员突击队以血肉之躯撕开敌军坚固防线，为主力部队推进打通关键通路，彻底扭转小宋庄战场攻坚困局。

战斗结束后，这张按满8枚红手印的请战书被连队妥善保存，70余年间一直陈列在连队荣誉室。每一次新兵入伍、每一次执行重大演训任务，连队都会组织全体官兵驻足瞻仰，重温当年党员突击队血战沙场的英雄故事。

一纸浸满热血的请战书，8名无畏向前的先锋战士，这场以命相搏的浴血突击，生动诠释了共产党员冲锋在前、舍生忘死的英雄本色。如今硝烟早已散尽，这份敢闯敢拼、向险而行的精神始终在代代传承，指引着新时代的广大党员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主动亮明身份、扛起责任担当。

链接历史

红军青石嘴战斗

■姚小锴 孟浩

1935年9月18日，红1军、红3军和军委纵队进驻哈达铺并在此短暂休整。根据俄界会议的决定，部队正式宣布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，由彭德怀任司令员、毛泽东任政治委员，下辖3个纵队，共7000余人。

9月23日，遵照中共中央指示，陕甘支队由哈达铺地区出发，以一部兵力东进闽井镇佯攻天水，主力则从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北渡渭河，于27日抵达通渭县榜罗镇。随后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举行会议，决定率陕甘支队进入陕北，与当地红军会合，在陕北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。会后，陕甘支队从榜罗镇一带向北进发，于10月5日到达西吉县单家集，击溃敌人1个营，进抵六盘山麓。

六盘山是陕甘支队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，也是中央红军北上陕北的咽喉要道。这里山势险峻，道路崎岖，素有“峰高华岳三千丈，险居秦关百二重”之称。蒋介石妄图依托六盘山的天然屏障一举消灭中央红军，紧急调集多支敌军在六盘山沿线的隘口、城镇层层布防堵截，同时命令尾随的追击部队持续施压，还派出战机不断开展侦察与轰炸，全力阻拦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，局势十分严峻。

10月7日上午，陕甘支队主力翻越六盘山后，其前卫部队在固原县青石嘴附近抓获国民党军的便衣侦察员。经审讯得知，敌东北军骑兵第7师19团负责运送给养的两个连队，此刻正在青石嘴休整。毛泽东知悉这一敌情后，当即决定歼灭这股立足未稳的敌人，第一时间召集作战会议，下达作战命令：以4大队担任正面攻击任务，1大队和5大队分别从两侧实施迂回包抄，13大队负责后卫警戒与掩护。要求各部形成三面夹击之势，趁敌毫无防备之际发起突袭，攻击行动要猛、要快、要狠，一举将其歼灭。

命令下达后，各部按部署快速推进，顺利抵达预定阵地后即刻发起猛攻。当面之敌正在吃午饭，突遭三面夹击后迅速溃散，四处奔逃。此战历时约半小时，歼敌200余人，缴获战马100余匹及大批弹药、军用物资。战斗结束后，部队快速完成战场清扫，毛泽东等率领1、4、5大队经青石嘴继续向北进军。

当日午后，担负后卫任务的13大队进驻距青石嘴5公里左右时，得知固原守敌的一支骑兵部队前来支援。该敌对红军后卫警戒力量毫无察觉，正于青石嘴脚下公路两侧休整待命，人员散坐于公路西侧草地，战马散放吃草，毫无戒备。

13大队前进通路被敌切断，大队长陈庚当即指挥部队向附近隐蔽山洼集结，同时向当地带路的老乡询问周边

路况，获悉敌阵地北侧1里处有深1米、宽2米的天然沟道（当地称大树根沟），可直通北山梁后侧，是当前唯一可用的隐蔽突围通道。此时敌军已完全控制青石嘴主路，能否抢占该沟口成为13大队顺利突围的关键。经现场观察研判，陈庚等定下决心：从敌北侧发起突然突袭，趁敌混乱之际夺占大树根沟沟口，沿沟道向北侧山梁方向突围。

14时许，13大队各连沿山梁侧翼隐蔽下山，向大树根沟秘密机动。前卫连接近敌阵地时突然发起火力急袭，敌即刻陷入混乱，我军顺势抢占沟口土丘构筑机枪阵地，以火力完全封锁敌骑兵冲锋路线。

战至16时，部队采用交替掩护的跳跃式突击战术，主力大部顺利通过大树根沟，进占北山梁，成功摆脱当面敌骑兵。此时敌第37军第8师两个步兵团进抵青石嘴，与沟外骑兵前后夹击，滞留在沟内的后卫连当即陷入重围。

危急时刻，后卫连依托沟内地形顽强阻击，集中火力压制敌进攻，牢牢守住沟口通道。战斗持续至18时，天色转暗，敌军忌惮夜战不敢贸然推进，攻势逐步减弱。后卫连抓住战机交替掩护突围，最终全部翻越北山梁，与大队主力胜利会合。

青石嘴战斗是红军翻越六盘山后的首战大捷，一举粉碎国民党军六盘山地区“围剿”计划，打通了红军北上的前进通道。红军以此战缴获的战马为基础，组建起第一支骑兵侦察连，正式开启我军骑兵部队的建设历程。

《孙臆兵法》——

战胜而强立，事备而后动

■熊剑平



出土于银雀山汉墓的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孙臆兵法》竹简。

《孙臆兵法》为战国时期齐国军事家孙臆所著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其书共计89篇、图4卷。该书在隋以前失传。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大批先秦竹简，从中整理出的《孙臆兵法》残简，为这部失传千余年的典籍补上了可靠的出土实物佐证。从现存的残文内容来看，全书系统总结了战国中期及之前的战争实践经验，不少战术思想都在《孙子兵法》基础上做了延伸，蕴含着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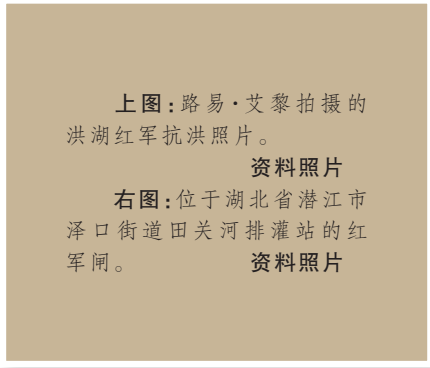
《孙臆兵法》积极倡导“立义”的战争理念，在充分肯定战争必要性的同时，反复告诫世人切不可“乐兵”好战，绝不能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。孙臆把“义”看作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要素，认为它是战胜强敌的关键依托。身为将领，只有真正认清“立义”的重要性，并在治军作战

中始终践行，才算读懂战争的本质，真正掌握用兵的根本规律。孙臆重视“义”的作用，却从不把它当成决定胜负的唯一要素，更不认为它是取胜的唯一手段，明确提出“战胜而强立”，强调必须依靠实打实的强大实力击败对手。他觐见齐威王时提出“事备而后动”，主张先通过“富国”筑牢根基，最终实现“强兵”的目标。在他看来，战前必须把各项筹备工作全部落实到位，做好周全的战争谋划，依托雄厚的军事实力争取胜利。

在作战指导层面，孙臆继承了孙武“以镒称铢”“避实击虚”的经典军事思想。《官一》篇有载：“坚阵敦口（兵），所以攻槽也。”“攻槽”指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，整句话的意思是靠自身严整稳固的阵形，集中部署的兵力形成压倒性优势，精准打击敌方防守空虚的区域。这种“以实击虚”的战术设计，正是《孙子兵法》“避实击虚”战略的体现。在与齐威王的对话中，孙臆更是直接把“必攻不守”明确定为“兵之急者也”，进一步凸显并强化了“避实而击虚”的用兵要义。

作为孙臆的标志性战役，桂陵之战的相关记载留存于《孙臆兵法》残简《禽（擒）庞涓》篇中，其内容可与《史记》等传世文献形成史料互证。此战中，孙臆同样采用的是“避实击虚”的战法，一方面以“示形动敌”等战术欺骗调动敌军脱离预设阵地，另一方面以“攻其必救”的策略创造决战窗口，最终给对手以致命一击。孙臆的军事思想既重视硬实力的建设，更强调力量的精准配置，将作战效能集中于敌方的薄弱点，这也印证了《孙臆兵法》与《孙子兵法》之间的思想继承关系。

中华兵典



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纪念馆，珍藏着一张老照片，受当年摄影设备条件限制，影像清晰度有限，但它承载的历史独一无二、弥足珍贵。这是著名国际友人路易·艾黎所拍摄的红军抗洪影像，真实记录了1932年洪湖苏区军民抗洪救灾、修筑荆江流域堤防的历史场景。

1931年盛夏，长江流域暴发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，沿江两岸一片汪洋。这场洪灾波及全国23个省份，受灾人口达8000万，不少灾区出现人畜漂流、房屋倒塌、民众流离失所的场景。

与天灾相伴的还有人祸，大洪水肆虐之时，国民党反动派非但不救灾，反而在监利县上车湾掘开荆江大堤，妄图以水代兵，借机消灭苏区和红军，直接导致洪湖苏区绝大部分区域被洪水淹没，数十万难民无家可归。面对极端严峻的灾情，1931年7月31日，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通过《关于水灾时期党的紧急任务之决议》，明确将抗灾列为党的“第一等战斗任务”，提出“以修堤和恢复生产为中心”的行动口号，自上而下成立各级救灾指挥部，全面组织苏区军民开展抗灾斗争。此后召开的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，又进一步通过《关于土地经济及财政问题决议案》，明确指出“修堤是目前第一等任务”，要求全体党员带领广大



群众同步推进生产自救与堤防抢修工作。

1931年10月初，贺龙率红3军进驻湖北潜江，随即投身东荆河堤险工险段的整治工作。其中，田关堵口复堤工程，正是在贺龙指挥下完成推进的。据当地亲历者回忆，为确保堵口方案的可行性，贺龙专程带领技术人员前往溃口现场踏勘，逐一摸清溃口形态、水势走向和筑堤条件。为探明溃口处深潭的水下地形，他率先跃入3米多深的冰冷潭水中，与技术人员反复潜入潭底探查，最终确认原址堵口复堤完全可行，统一了救灾指挥部的思想共识。随后，贺龙率第9师第25、第26团指战员和周边群众，一同投入堵口复堤工程。

在近两个月工期里，两个团的红军官兵全力投入堤坝修筑战斗，面对国民党飞机多次低空轰炸扫射、敌军不断骚扰的险境，红军战士一边持枪警戒，喊出“武装保卫修堤”的口号，一边挥锹抬土参与筑堤，同来自潜江、荆门、江陵、监利的民工并肩作战，用血肉之躯筑牢防洪屏障。在军民接力的奋战中，大家靠双手和双肩，以一担担泥、一筐筐土的原始作业方式，筑起一条长1500米、底宽20米、堤顶面宽2米的坚固堤坝。这项堵口复堤工程直接守护了田关下游400余

万亩农田的汛期安全，最大程度挽回了洪灾带来的损失，将万千被困在汪洋里的群众从危难中解救出来。周边群众感念红军的舍身付出，自发将这段袍台军民热血的堤防命名为红军堤。1960年，当地在该段老堤原址基础上，新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天关水利闸，命名为红军闸。水闸共设8孔，单孔净宽4米，竣工后专门竖立纪念碑，将贺龙为工程发来的贺电内容镌刻其上，永久留存这段红色治水记忆。

田关堵口复堤工程，只是湘鄂西苏区红军抗洪的诸多壮举之一。当时的洪湖苏区，在党的统一领导下，一边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“围剿”进攻，一边发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，全面投入抗洪救灾的各项工作。据史料记载，湘鄂西苏维埃政府专门划出全部财政收入的30%用于堵口复堤，同时发行30万元水利债券补充工程经费。各级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主动利用休息日参与义务劳动上堤务工，红军指战员也在反“围剿”的作战间隙抽派兵力支援修堤。监利县委专门成立“赤色灾民团”，有组织地带领群众开展生产自救。就这样，在监利、江陵等县的一处处险工险段上，一条条新修的堤防在军民的并肩奋战中接连成型，牢牢守住了洪湖苏区的生命命脉。